

北京口述历史

定宜庄 主编

定宜庄 著

胡同里的姑奶奶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北 京 口 述 历 史

胡同里的 姑奶奶

定宜庄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同里的姑奶奶 / 定宜庄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7. 2

(北京口述历史)

ISBN 978-7-200-12285-5

I. ①胡… II. ①定… III. ①妇女—社会生活—史料—北京市 IV. ①D4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0809 号

北京口述历史

胡同里的姑奶奶

HUTONG LI DE GUNAINAI

定宜庄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246 千字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2285-5

定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总序

在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中，我想通过 80 余名老北京人的口，对近百年来老北京人的生活和变迁，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

通过人、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之口，也不是通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以及历史事件来呈现北京这个城市，是我近 20 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尝试，也正是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才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进入到这座城市，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灵魂和神韵。^①

既然我的宗旨是从“人”出发，所以本套丛书的 5 卷，初衷也是按照被访者人群的不同而划分的。然而，凡是对北京城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入清以来北京城的特点，便是不同的人群，大体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或者说，在 1949 年以前，北京人就是由几个不同地域上居住生活的不同人群组成的，这样的几个不同地域上的不同人群，各自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地域上的人群的特征，却又因此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北京城，以及城中的居住者——北京人。这正是北京这个城市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化特性。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

^① 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访谈，尤其是深入访谈，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中。最近几年，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区消失之前》《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大历史·小人物》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对常人春、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也正在编辑之中。

几个区域，在北京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个区域，也不能称之为北京城的“精华”，哪一个区域，也不是北京的代表和核心。这便是我访谈过百余名北京人之后的收获所在。

我说的这几个区域，大分起来，就是内城、外城和城郊三部分。虽然近年来它们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遽消失，甚至已经被基本泯灭，尤其是将宣武、崇文两区分别并入西城、东城两区之后。但是自清军入关到1949年之前的几百年间，内城住皇室成员和八旗官兵，外城住汉回商民、流人士子的格局却始终清晰可辨。至于北京城郊，既是京城的延伸部分，又因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位置以及与京城的紧密联系，当然应该被视为京城中不可割舍的一个重要部分。

由于在这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即内城部分的分量远远超过其他两部分，所以我将这部分人群再一分为三，这便形成了5卷。出现这种有轻有重情况的原因，与我最初选择访谈样本时的偏重，以及我的能力不逮有直接的关系。具体地说，当我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时，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居住格局与人群特点之间存在如此直接的关系，我一味去寻找的，只是最符合我心目中“老北京人”标准的那些人，而这样的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内城。尽管我后来意识到了京城人群按地域居住的特点，也意识到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并希图寻找到更多居住于城南和郊区的被访者，但一是他们中世代居住于京城者，本来就远远少于内城那些八旗后裔，二是由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变迁的频繁和他们居住的分散，很难寻找到更多的样本，这便是我所谓能力有所不逮的含义了。

对于这5卷中每卷内容的特点和编撰宗旨，我在各卷的前言中都分别有所介绍，此处不再详细说明。总之，按照不同地域和人群分成的这套5卷本的丛书，既各自独立成编，围绕的又是同一个城市、同一个主题，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本书是在我2009年出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基础上，经

过大量补充修订而成的，事实上，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可以看作是另一套书了。

首先，此次将这套丛书分为5卷，有了可以伸展补充的余地，遂得以将一些尚未发表过的访谈成果收入，究其分量，占全套丛书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访谈成果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之后所做的部分访谈。自《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距今已经过去整整6年，但我寻找老北京人并为他们做访谈的工作却迄未间断，这些后来做的口述在访谈宗旨和方式等方面虽然与此前基本一致，但在对“北京人”的定义上，则不得不有所放宽，那就是将原先把“北京人”限定在“民国之初（1911年前后）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一条，推迟到了1949年前后，也就是说，凡是1949年前后进入并居住于北京的人，便都被纳入到我的访谈对象中。做这一修改，有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就是随着时间的飞速流逝，即使以1949年画线，按被访者当时18岁计，如今67年过去，也已经是85岁的耄耋老人了，抓紧记录他们的历史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更何况，1949年前后是新旧政权交替，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新的意识形态开始创立并生长的年代，本身也包含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另外，正是由于放宽了对“北京人”标准的限制，我得以将此前曾经做过，但因不符合这一标准而未收入的访谈，也纳入到了此书之中。

其次，在编撰本套丛书的过程中，让我最感慨也最有收获的，并不是在量上的增加和内容上的添补，而是去寻找多年前的被访人，并对他们所做的回访工作。由于历经数年甚至十数年，仍然在世的老人已经不多，这样的回访便尤显珍贵。通过回访，补充和修订了初次访谈时未曾顾及的细节，加深了我对原来访谈的内容和被访者的理解，更凸显了访谈的意义。更有意味的是，有些被访者与我在数十年间从未中断联系，有些已经成了朋友和“自己人”，而我们相互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深入交流，最终能够进入较深层次的主题，这一过程或如曲径通幽，或如层层剥笋，正与史家所做考据的过程相似，其间的艰难与乐趣，很难

用言语表达出来。还有一些被访者已经逝世，但当我看到他们最终结局的时候，再回想他们当年访谈时的情状，其间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也颇令人感叹唏嘘。总之，通过此次回访，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深度访谈对于口述史的重要性。

再次，是对部分口述，从文献上下了些钩沉索隐的功夫。一方面附上相关的档案材料以资考订佐证，一方面在注释上做了大量的补充，力图将口述背后的故事，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总之，一个具有职业性好奇的史家，当他面对躲藏在自己访谈对象背后的，远比口述者闪烁其词的、语焉不详的甚至漏洞百出的讲述更为精彩、更为深沉的真相时，很难就此止步。即以唐德刚先生为胡适所做口述为例，胡适为唐先生讲述的，仅仅是胡适那复杂丰富一生的冰山一角，如果不将隐没在水中的那更大的部分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人们并不能知道这座冰山是什么样的，而这正是负责任的史家应该努力去做的工作。如果再深入一步，那么这座冰山所露出的部分为什么是那个样子，就更值得史家去探究和分析，而这，往往就是对某个具体个人所做访谈的最大意义所在。

辛亥革命迄今百余年，北京城的鼎革，用天翻地覆形容毫不夸张；1949年以来的变化，较之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更甚；而改革开放之后，或者就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迄今的短短6年来说，变化之巨大，竟然又超过了以往的百年，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目不暇给的程度。如果说民国时期的鼎革更多表现在社会的变迁上，1949年以后是对城墙、古建等物质文化的损毁，那么近年来的这一变化，则是因外来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导致的“老北京人”的消失。说消失也许并不准确，准确的应该是，当北京人口已达数千万的今天，区区百万的老北京人，早已湮没在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的众人之内。尤其是随着京城大规模的改造拆迁，老北京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搬离祖上世代生活的胡同街道，散落于城外诸多新建的小区之中，以北京的“人”为载体的京城文化，也随着他们而消失湮没于无形之中。甚至被老舍先生誉为世界上

最优美动听的“老北京话”，如今也难以听到了。在北京城经历的诸多变迁中，这场“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彻底，同时，也最令人触目惊心。

所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是我对曾给予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是我对这个正在急速沉没的城市，留下的最后一个纪念。

作者谨识

2016年2月

序言

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在京城内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经过顺治五年至六年（1648—1649年）的大规模清理，原来居住在内城的汉人无论官民都被尽数驱赶到外城（又称南城）居住^①。内城从此成为清朝皇室和八旗王公贵族、官兵的聚居区。形成了清代京城独特的旗、民分居格局。驻于京城的八旗官兵又称“京旗”，是八旗中最精锐的部分，在八旗内也享有高于外省驻防的地位和待遇。他们均根据所在旗分，按照八旗方位居住，其具体方位是：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清政府还以皇城（紫禁城）为中线，将八旗划分为左、右两翼：镶黄、正白、镶白和正蓝四旗位于城东，为左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和镶蓝四旗位于城西，为右翼四旗。在各旗防区内又分汛地，汛地内又设堆拨，汛地与堆拨之间设立栅栏，京城的九座城门均由士兵把守值勤，按时启闭，清政府还将明朝时建立在城内的会馆、戏院悉数迁出，严禁在城内开设戏院、赌场，使整个北京内城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兵营。这样的居住格局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尽管在清中叶以后，八旗禁旅的军事职能逐渐减弱，旗与旗之间的变动也逐渐增多，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对京城实行大规模改建之前，

^① 《清世祖实录》卷24，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甲申；《八旗通志初集》卷23，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434页。

却仍然依稀可辨。

本套丛书中的内城部分分为三卷，一卷《宅门儿·府门儿》是为宗室王公卷，另外两卷则都是为八旗官兵后裔所做的访谈，由于这部分访谈人数多、分量重，只能再分两卷，而如何将这个自成一体的人群划分开来，是一件颇踌躇之事，最后的决定，是将其中关于妇女的口述单独提出，另编成册。究其原因，旗人妇女是我做口述史的最初入手之处，我对这个人群最熟悉，也花费过最多的心力，对于她们与男人的不同，也有着很深切的体会。

按照性别来将旗人后裔的访谈分成两卷，是我做的一个新尝试。这样的划分，使原先只是按居住的不同地域或不同人群所做的分类，呈现出了另一种样貌，具体地说，就是将京城旗人女性独特的气质，鲜明地呈现出来，八旗男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点也因此而被衬托和凸显出来。仅仅是简单的重新分类，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这是连我自己事先也未曾预料到的。

独具特色的京味儿，在八旗男性与女性的后代身上，有不同的体现，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同一个整体的两个不同的侧面，这两个侧面，几百年来同处于八旗制度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但以往的研究和论述，却大多只关注了其中男性的一面，这对于了解八旗子弟这个群体，当然是不全面的。

本书以“胡同里的姑奶奶”命名，是想突出这些被访者的两个特征。其一是“胡同里”，特指这些被访者居住的独特地域，即北京内城。在本卷口述中，年龄最大的胡玉明老人说：

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哪，这楼群里头找不着，一百户里边也没有一户老北京人，全是全国各地的，四面八方的。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就是那胡同里头有，还真有。您瞅，由东单说，一直到北新桥，一个胡同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到现在也算上，什么样儿的家庭都有，高级点儿的、中级点儿的、低级点儿的，都有。都是纯粹的老北京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还是有。

讲的便是老北京人（主要是旗人后裔）与所居住的胡同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二是“姑奶奶”，老北京人所谓的“姑奶奶”，大多特指旗人妇女，这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却最能表现出旗人妇女特有的气质和风韵。

尽管旗人女性无论在京师内城还是郊区，也无论在京师还是外省的八旗驻防地，或者东北三将军的统治区，都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于汉人和其他族群妇女的典型特征，但作为占据八旗总数之半的京旗甲兵和他们的妻女，仍有着与生活于其他地区的妇女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清朝覆亡之后，虽然所有的八旗旗人都经历了“从富贵与悠然的境地突然堕入贫穷”的巨大转变，但驻守于全国各地的旗人遭遇并不完全一样，具体到京旗，并没有如西安、杭州等处旗营那样遭受战火的屠戮，给他们印象最深的，除了旗饷（也就是“铁杆庄稼”）被裁停之后生计的贫困之外，就是在求学、就业等方面受到的歧视，这导致他们不得不隐姓埋名，改写民族成分，并最终如“水银泻地”般地消失在汉族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本书选取的7名满族旗人后裔中，除了从外省驻防城逃来京师的文毓秋老人之外，其余的6名，只有吴效兰女士一人报了满族，其余5名，虽然是最有旗人味儿的“姑奶奶”，却都报了汉族。作为汉军旗人后代的一对姐妹，认为自己本来就是汉族人，蒙古八旗的后代更是理所当然地回归到蒙古人中间。这一现象的意义，不仅仅是为族群认同问题添加某些材料，还尤其在于，它为北京旗人在民国年间的迅速消失，提供了生动的佐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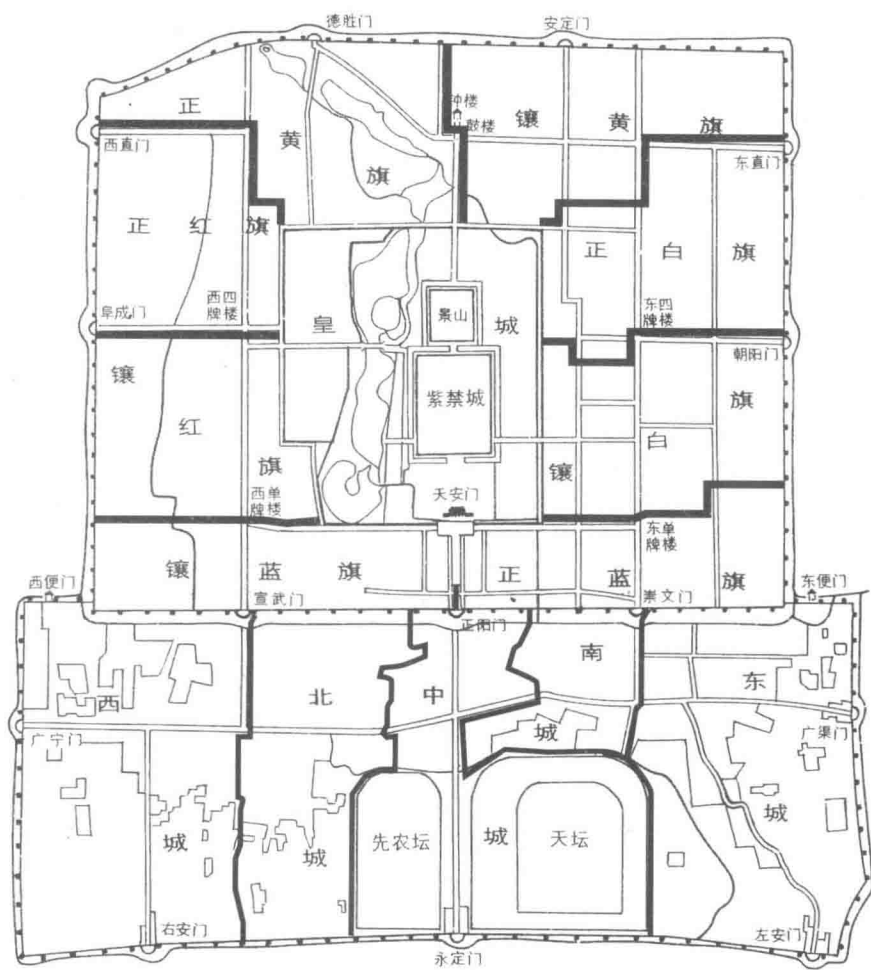
然而，即使他们将民族成分改成了汉族，但“姑奶奶”的特点在她们身上却仍清晰可见。这表现在她们由于生长在天子脚下，有见过世面的大气和见识，也表现在她们由于男人长期出征在外而不得不持家主事锤炼出的果断能干和坚忍。当然也有另一方面，在严格按旗划界的京城，她们的社会交往圈和婚姻圈具有相对封闭和狭小的特征，以及由于

祖祖辈辈靠“铁杆庄稼”生活造成的贪图享受、讲求排场的毛病。凡此种种，在本书 10 篇 11 名妇女的口述中，有着具体的体现。而在这种种特点中尤为突出的还是她们的口才，几乎所有我访谈过的旗人妇女，都有“出口成章”的特点，加上北京话生动、流利的表现力，作为以口述来表现的人群，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

本书中有 6 篇口述来自《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此次出版添加了诸多注释；还有 4 篇，采自另一部、也是第一部口述史拙作《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 年版）。需说明的是，这 4 篇访谈在体例上，与后来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存在某些不同，最主要的是，当时的访谈没有纳入我的问话，这虽然遗憾，却已很难弥补。至于标题、格式等，我都尽量做了改正，力求与后来的体例统一。访谈者按中有些是原来的，也有些做了补充添加，都一一做了说明。

考虑到这些旗人女性所居住胡同的曲折情况，仅凭口述的说明很难明白，本书在每篇口述中都以手绘图的方式，将她们所住的地点和在京城的位置，以及她们活动的主要范围和街巷名称予以表述，以期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这是本书所做的又一个尝试，因为这些图示将北京旗人女性生活圈子之封闭、狭窄的特点体现无遗，是比用文字和语言都更直观也更生动的表达方式。需特别说明的是，这些手绘图都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苏柏玉同学所绘，特此致谢！

我曾为我的第一部口述史著作取名为《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受到了书中一位被访者、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市宗教局）原副主任张寿崇先生的批评，说这个名字太悲观、太消极，但刚刚说完此话不久，年近 80 岁的他就倏然仙逝。这让我更深切地感觉到，满族这个族名还在，但残存在这些老人记忆中的、这个民族在一个已逝时代的生活、文化和观念，都已经随着这些老人的离去而迅速消失，而且将一去不复返，永远无法再回忆、再复制。在这里谨向已故的张寿崇老人和其他逝去的老人们致以深深的敬意，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



乾隆十五年 (1750 年) 北京八旗方位图

目 录

序言/ 1

一、我妈老说：“我没得过皇恩”——祁淑洪口述/ 1

二、胡同里的姑奶奶——李清莲口述/ 21

三、纯粹的老北京人——胡玉明口述/ 57

四、筒子河畔西连房——吴效兰口述/ 84

附录 皇圈圈里度童年——张宗尧、张碧君口述/ 105

五、犹记当初未嫁时——张国庄口述/ 131

六、皇城内的百姓人家——陈允庄口述/ 153

七、淡然远去的艰辛——郭淑惠口述/ 177

八、不受点灾难，一生就白活了——文毓秋口述/ 201

附录 关于郭同震/ 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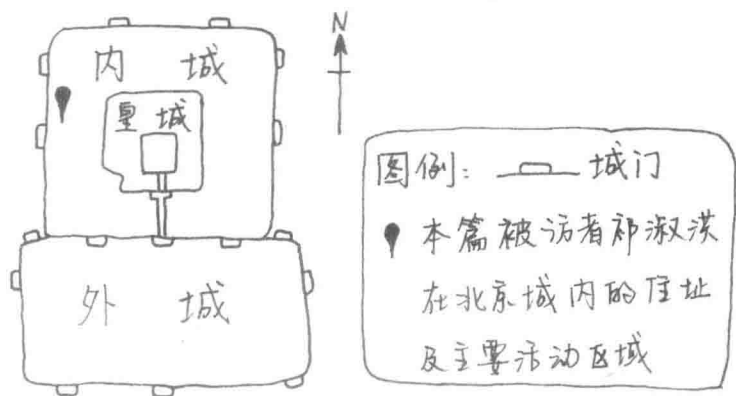
九、我说多困难也过来了——鄂凌英口述/ 232

十、父亲母亲让我们读书——蒋亚男、蒋亚娴口述/ 244

附录 以阎氏家族为核心的亲戚关系（2000年4月作）/ 266

后记/ 267

一、我妈老说：“我没得过皇恩” ——祁淑洪口述



时 间：1997年11月13日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祁淑洪家

访谈者：定宜庄、印红标

在我做的所有访谈中，这是第一篇，也是我持续不断地为北京人所做的将近20年访谈的开端。正因为祁女士的讲述如此生动，如此精彩，才给了我日后投入这项工作的兴趣和信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为我日后的访谈方向，提供了某种启示。

[访谈者按](1997年)祁女士现在的民族成分是汉族，但她却是我访谈的几十名老人中，最有旗人味儿的北京旗人后代。她自述只上过几

年学，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将她的口述与老舍先生以及其他京味作家的作品相参照，细品其中的异同，是饶有趣味的。

祁女士口述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她的母亲。在访谈中，她谈到其母因受儿子（即祁女士的大哥）株连，于“文化大革命”刚开始（1966年7月）即被遣送山西，此后如何没有再讲。据祁女士的女儿和女婿所说，祁女士的母亲终因不堪此种羞辱而自尽，这是祁女士因伤心而不愿提及的一段往事。但此事却非常鲜明地凸显了祁女士母亲那种自尊、刚烈的个性，恰与祁女士所述她平日的言谈作风相合，故征得其女儿和女婿的同意，补注于此。我在寻找满族老人作为访谈对象的过程中，听到过不止一例像老舍先生那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事例。“旗人一辈子就要这脸面”，此话平时说来多为贬义，但在特定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却是这个民族特有的高贵和自尊，这在那些普通妇女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再不能与她们促膝谈心，洵为憾事，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她们的敬意与追悼。

祁女士读了这篇整理稿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发表议论说：“满族人的末落（应为“没落”）状况，我的子女谁也说不清了。满族人的末落与其他民族不同，满族人名存实亡。”特附于此篇访谈之前。

[访谈者按](2011年)本书此次出版之前，我曾与祁女士的女婿印红标教授有过联系，得知老人现在仍然身体健康，这是令人十分欣慰的事。感谢印红标教授全家的大力协助，得到祁淑洪老人的母亲定氏的珍贵照片，在此对印教授全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定氏老人是这篇口述所讲述的主角，也是本书中最令我喜爱和尊重的满族老人之一，更何况她还是我多年来遇到的第一个与我同姓的满族人（回族中姓定的人我遇到过不少），这应该是天上掉下来的缘分了。

这篇访谈曾将祁老人的名字记错，尽管印教授认为他的岳母对名字的汉字似乎并不在意，他说：“不知道是因为读书不多还是旗人的汉化名字都有类似问题”，但我认为也是我的疏忽所致，在此向祁老人表示

歉意。此次出版，根据户口普查时片警写在户口卡上的名字改正过来，特此说明。

还须特别提到的是，祁女士虽然读书不多，她所述内容显然是从她生活经历而不是从书本中得来，但所述很多内容，不仅在文献中可以找到印证，有时甚至准确到丝丝入扣，对此我在注释中已经一一说明。这也是在多年之后我再整理此文时仍感惊讶和感叹的一点。

祁淑洪(以下简称祁)：您是让我说我母亲、我们家里的事是吧？我姓祁，属狗的，民国十一年（1922年）上生人，75周岁了，就是在北京出生的。原来我们在东城北池子住，属正黄旗。我妈说旗人都是东北过来的，根儿都是东北的，来了就跑马占地^①，我也不懂得这句话。我为什么没报满族也是受我妈的影响，我妈老说：“我没得过皇恩。”还说这老旗人没多大意思。

1. 我母亲

祁：我妈挺开朗的，我父亲常说：“别瞧我比她大十一，她什么都记得。”她“文化大革命”时死的。我哥哥在地质部工作。他过去当过督察，“文革”时因历史不清楚，1966年7月被轰到山西朔县，我妈受他的连累，也跟着去了。她是老北京人儿，觉得挺狼狈的，说：“人家那儿都有穿夹的了。我们还拿把大芭蕉扇，可现^②了，谁都瞅我们。”旗人一辈子就要这脸面。

我妈要活着，这会儿算起来也该100多岁了。

我妈老和我说，说得还怪可乐的，说“你们多好呀。有父母，我

^① 1644年清军入关后，为安置从盛京（今辽宁沈阳）带入关内的大批八旗官兵及其眷属，曾在北京及其周围圈占了大片土地，分配给八旗官兵耕种，这就是清初著名的“圈地”事件，民间将其称为“跑马占地”或“跑马占圈”。清初大规模圈地共进行了3次，历时20多年，这种对农民土地与家园的残暴掠夺，激起了京畿一带汉族农民的强烈反抗。

^② “现”是北京话“丢人现眼”之意。